

马克思主义治理观及其对渝东南 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曾咏辉¹

(1. 长江师范学院, 重庆 408107;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2442)

【摘要】: 马克思主义治理观蕴含着丰富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国家承担巩固阶级统治的政治职能、国家承担行使公共权力的社会职能、民族与国家相伴而生并协同发展、法律是国家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四个方面。渝东南民族地区相对落后的治理理念、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成为实现治理现代化目标的主要瓶颈。这需要充分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治理观的历史和哲学智慧,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加强民族教育、依法治国与以德治理并举、紧抓高质量发展龙头等维度寻求破解之道,从而为推进治理现代化提供根本保证、凝聚群众力量、赋能人才培养、提供秩序保障和夯实物质基础。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治理观 渝东南民族地区 治理现代化 现实价值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21)4—0037—07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确立了要在 2020 年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1]。这充分表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愈加科学化、专业化与精细化。马克思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等经典著作中形成了丰富的治理理论。在全面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尤其是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充分发掘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治理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治理观的丰富内涵

国家与政府组织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运用公共权力管理社会的行为,就是治理。综合来看,马克思主义治理观主要蕴含如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国家承担巩固阶级统治的政治职能

在恩格斯看来,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

¹**作者简介:** 曾咏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江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重庆民族地区公民法律素质提升路径研究”(2017YBWT11);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国家治理视阈下重庆民族地区公民法律素质提升路径研究”(17skgl96)

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2]186}。早期人类社会生产力低下，社会制度主要受血缘关系支配。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地发展，私有制和阶级对立的基础也日益发展。而伴随着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扩大，社会却陷入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为了使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2]187}，国家就是这种产生于社会，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特殊力量。可见，国家是基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而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2]188}。从古代城邦国家，到中世纪封建国家，再到现代议会制国家，都“直接地宣告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阶级的组织”^{[2]189}。为了巩固本阶级的政治统治地位，国家必然实行具有强制性和压迫性的阶级专政，运用镇压和剥削等暴力手段。在马克思看来，国家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3]212}而已。随着生产力进一步发展，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公社“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4]95}。但这种“收回”也依然需要利用“国家”作为政治统治工具。在社会主义阶段，资产阶级等非无产阶级势力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借助“国家”的政治统治功能和暴力工具，才能在稳固政权的基础上逐步改造社会。所以，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承担着巩固阶级统治的政治职能。

（二）国家承担行使公共权力的社会职能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究其本质来讲，国家“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2]193}，包括公共权力在内的政治权力也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3]422}。但是，统治阶级为了调和阶级矛盾，将阶级斗争控制在可控范围，还必须通过行使公共权力来维持社会秩序。最初的时候，“随着工业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各种生产部门……之间的分工日益充分地发展起来……因而就需要创设新的公职来处理这种利益。”^{[2]128}随后，在地区部落（兼具自治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功能）的基础上组成国家，由人民大会执掌最高管理权，由“执政官和其他官员掌管各行政部門和司法事务”。^{[2]132}此时，国家已经成为公共权力的代表，公共权力亦随着国内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邻国版图的不断扩大和人口的逐步增加而日益加强，并逐步上升为国家的主要职能，成为国家平衡各方利益、缓和阶级冲突的“政治权威”。但是，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私有制将最终被扬弃，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3]422}，国家将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承担起维护社会利益的管理职能。当然，恩格斯也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不能疾风骤雨地“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4]227}，而且即使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实现了阶级专政，也依然需要保留国家并继续发挥其部分阶级统治职能，待条件成熟时方可过渡到完全行使公共权力的社会职能，真正实现公共权力向人民主体性和社会公共性的回归。

（三）民族与国家相伴而生并协同发展

恩格斯很早就注意到民族和国家由部落发展而成，在《起源》中又通过对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人等三种典型模式的深度分析，详细阐述了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路径，论述了民族与国家相伴而生且协同发展的原理。一般情况下，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部落在“基本方言相同”和“经常的交换”的基础上，在组织生产和对外斗争的过程中，对内对外都团结得更加紧密，亲属部落的联盟也变得必要。部落联盟在内部长期联合与结盟的过程中，在对外掠夺和防御的过程中，进而形成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和社会组织形式，形成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和共同经济生活的民族。民族形成后，对内对外的经济联系愈加紧密，阶级斗争和其他利益冲突有增无减。此时，消除对立和维护秩序的需求催生了国家，雅典国家的产生就反映了这一典型特征。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很快就都杂居起来”^{[2]124}，甚至还出现了不属于这些团体的外来移民。而这些外来移民因不能参与所在胞族或部落的管理事务，难免“扰乱了氏族制度机关的正常活动”。^{[2]124}为进行补救，雅典通过设立中央管理机关，从而导致“相邻的各部落的单纯的联盟，已经由这些部落融合为单一的民族(Volk)所代替了”。^{[2]124}当氏族制度走到尽头的时候，“国家已经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2]128}。美洲的情况同样如此，个别地方的亲属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结为永久地联盟，这样就朝民族(Nation)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2]105-106}。可见，民族同国家一样，皆从部落发展而来，因而延续了稳定共同体和共同地域等基本特征。同国家以阶级对立为特征、以巩固阶级统治为目的不同的是，民族主要强调血缘关系、共同的语言和生活地域。虽然民族在规模及职能等方面未能超越国家，但是民族作为稳固的人群

共同体及稳定的社会组织的功能却是无法替代的。各民族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团结信任等因素，依然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基础。正是基于这样的共通性和差异性，国家和民族能够相伴而生并协同发展。

(四)法律是国家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以法律为代表的公共权力在社会秩序的维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恩格斯认为，“公共权力的设立”^{[2]187}是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的区别之一，“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2]187}。不过，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的官吏凌驾于社会之上，“他们作为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代表”^{[2]188}，已经无法获得最平凡的氏族酋长无需通过强迫手段而获得的那种无可争辩的尊敬，他们“必须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2]188}。然而，在与法律一起共同构成公共权力的“武装的人”及“物质的附属物”背后，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借助国家而在经济上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对此，马克思也有深刻论述，“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那部分人的利益，总是要把现状作为法律加以神圣化”^[5]。简言之，法律就是统治阶级利用其经济和政治的优势地位而获得的一种镇压和剥削被统治阶级的手段。一般情况下，不同阶级之间具有明显的力量差异，阶级镇压和反抗成为常态，这也是为什么《共产党宣言》宣称，“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在不同阶级互相斗争的过程中，国家往往扮演着“表面上的调停人”的角色，通过法律等公共权力作用于社会，以“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2]187}。

二、渝东南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困境透视

渝东南地区¹是一个以土家族和苗族为主体，散居着汉族、独龙族、回族、白族、高山族、蒙古族、藏族等近 30 个民族、幅员面积占重庆市 24.08%²的特殊地区。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伟大民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少数民族也不能少。”^[6]近年来，渝东南民族地区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推进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依然面临着一些困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治理理念相对落后制约治理效能提升

地区治理是社会、国家治理的基础，不同的治理理念将形塑不同的治理模式，带来不同的治理效能。要实现渝东南民族地区的治理现代化，首先要有科学的治理理念作为指导。然而，渝东南民族地区由于受地理环境、文化氛围、经济状况以及民族传统等多重因素，尤其是治理理念的影响，制约了地区治理效能的提升。一是唯 GDP 论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缺乏可持续性。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然而，渝东南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状态，为改变现状，一些地区政府将经济发展放在一切工作之上，甚至为了追求高位的 GDP 指标，对肆意开采矿产资源、破坏森林修建避暑房、企业环境污染视而不见，严重影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二是人治理念根深蒂固制约法治秩序形成。长期以来，由于人治理念根深蒂固，法治规范理念尚未深入人心，并受宗教文化的影响，民众在社会活动中形成了对权力、个人权威以及宗教习惯的顺从和接受，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找熟人打招呼，作为外力输入的法治秩序难以形成。三是全能政府理念导致管理过多。一些政府公共部门对地区公共事务无论“该管与不该管”“能管与不能管”“管得好或不好”，习惯一揽子包办，导致治理主体单一，行政色彩浓厚，尚未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局面。四是重权利轻义务制约民众积极性发挥。随着国家对民族问题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日益重视，地方政府和社会愈来愈关注地区的“民族化”和政策倾斜。然而，以实现民族平等为初衷的各项倾斜政策却常常被错误解读为民族地区应该享受的权利，从而导致义务意识淡薄，等靠要思想严重。而这种错误的解读一旦扩散，无疑会给民族团结和地区治理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进而将影响治理效能的发挥。

(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制约治理资金投入

渝东南民族地区地处四川盆地东南部大娄山和武陵山两大山系交汇的盆缘山地，位于渝湘鄂黔结合部，也是集民族地区、三峡库区、革命老区等于一体的区域。很长一段时间，渝东南民族地区没有通火车和高速，交通极为不便，导致当地居民生活

环境相对封闭，信息闭塞，思想守旧，再加上市场资本薄弱、政策依赖性强和贫困的代际传递等因素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随着治理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亟需立足渝东南民族地区的发展实际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提升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然而，这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提供支撑。根据重庆市统计局和渝东南“两区四县”官网公布的相关数据，2018年占重庆市常住人口8.8%³的渝东南民族地区生产总值仅占重庆市生产总值的5.49%⁴，2019年仅有武隆和黔江的贫困发生率低于全市的贫困发生率⁵，2019年渝东南民族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856元，仅占重庆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4。⁶可见，渝东南民族地区落后的经济发展难以能为治理现代化提供足够的资金保障。

（三）文化教育相对落后制约治理水平提高

要实现治理现代化，必须要有治理专业化水平较高的基层干部队伍和较高的民众文化素质。但是，由于自然、历史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渝东南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基础薄弱，优质教育资源短缺，文化教育发展显得相对落后。如，无论是各级各类学校的数量还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以及教育质量，渝东南民族地区均远远低于重庆市平均水平。文化教育的落后导致治理人才缺乏、民众的文化素质无法适应治理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而相对落后的经济、欠便捷的交通又无法吸引优秀的人才补充进基层治理干部队伍，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均制约了治理水平的提高。

三、马克思主义治理观对推进渝东南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的现实价值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正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而努力奋斗，充分理解并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治理观，对于推动渝东南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为推进治理现代化提供根本保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3]413}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实现对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领导，他进一步指出：“我们是阶级的党，因此，几乎整个阶级（而在战争时期，在国内战争年代，甚至是整个阶级）都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行动，都应当尽量紧密地靠近我们党”。^[7]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克服重重困难，实现民族解放，建立新中国，使中华民族“站了起来”；四十余年改革开放的艰辛探索，让一穷二白、积贫积弱的中国“富了起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不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吹响了让中华民族“强起来”的进军号角。中华民族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征程和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8]凝聚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改革合力，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为推进治理现代化提供根本保证。这要求渝东南民族地区各级党组织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这是政党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确保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的重要保障。这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厚植清正廉洁的为官底线、锻造敢于负责的担当精神。

其次，切实增强执政本领。党员干部要善于引导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凝聚谋求新时代渝东南民族地区发展的共识；有效回应新时代民族地区的风险挑战、推进新时代民族地区的全面改革、完成新时代民族地区的使命任务；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保持战略定力；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加强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互鉴。

最后，要有勇于自我革命的勇气。党员干部要通过不断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提升自我政治境界和道德境界，确保在深刻理解党的性质宗旨中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推进治理现代化凝聚群众力量

《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41]}“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正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根本立场的体现。正是基于如此彻底的革命立场,无产阶级革命才推翻了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掀起了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潮。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觉担当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进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9]201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10]为此,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凝聚群众力量与人心,助推渝东南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

第一,各区县地方政府必须牢记“公权力姓公,也必须为公”^[11]的根本宗旨,建设为人民服务的服务型政府,防止公共权力异化。在中国,巩固阶级统治的政治职能和行使公共权力的社会职能是合二为一的,皆集中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政府治理的现代化,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与本质要求则是转变政府职能,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实现治理主体的现代转型。对渝东南民族地区来说,政府职能转变的任务更为艰巨。这要求各级政府认识到发展仍是解决新时代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认识到“共享”发展理念明确了为谁发展的问题,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共产党的宗旨,明确了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认识到高质量发展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协调发展。

第二,着力从建立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上下功夫。一要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在基层选举、重大事务民主决策以及事务的日常管理与民主监督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宣传、号召与组织作用。二要创新自治方式。如,建设村(居)民议事协商平台,完善城乡社区协商机制,引导广大民众养成有事多协商、遇事多协商、做事多协商的良好习惯,依法表达意见和建议;成立村(居)民自治小组,帮助村(居)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做到小事不出村民小组(小区),大事不出村(社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村(居)民自己的事“自己议、自己管、自己办”;有条件的社区可以依托互联网平台,探索实现微心愿、组建微组织、打造微共建、实施微民主、引导微自治、开展微监督的“微治理”新模式。三要加强制度建设,以制度确保基层民主的规范化和程序化。

第三,要明确角色定位,各级政府既不能当小政府的“守夜人”,也不能做全能政府的“划桨者”,而应该扮演好“服务者”。要聚焦民族地区发展所需,百姓所盼,民心所向,尤其是要全力推进乡村振兴,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提升治理的温度,为激发各族群众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注入不竭动力。

(三)加强民族教育为推进治理现代化赋能人才培养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在生产力三要素中居于支配地位和主体地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纵观各国发展经验,人才是发展之本,教育是人才培养之基。人才外援不足与内部造血功能薄弱是渝东南民族地区推进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现实短板。此时,除放眼全国乃至全球,延揽优秀人才之外,加强民族教育,打造自身优秀的治理人才队伍、提升民众文化素质更是实现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因子。这要求:

第一,各级政府从政策保障、资金投入、人力资源、结构布局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学前教育的公共服务水平、加快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优化各级各类学校结构布局,补齐渝东南民族地区教育短板,全面提升民众文化素质,实现民族教育现代化的实质公平。

第二,各级各类学校着重加强民族认同教育,培养有情怀、有担当、留得住的本土优秀人才。如,以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为手段,将酉水河流域土家山寨文化、阿蓬江流域土家族苗族民俗文化、酉阳土司历史文化、洪安边城传统商贸文化、秀山龙凤花海文化以及“巴盐古道”文化等具有当地特色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纳入教育教学体系,激发民族同胞的

民族自豪感与归属感，进而增进民族认同，促进本土人才乐于参与到家乡的治理之中。

第三，加强对地区基层治理人才的专业培训。通过“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打造一支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专业精神、尊重多元的文化价值观和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具有较强的语言沟通能力和有责任担当精神的基层治理队伍。

(四)以依法治理与以德治理并举为治理现代化提供秩序保障

有序的治理秩序是民族地区安全稳定与和谐发展的基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12]依法治理和以德治理并举，是渝东南民族地区重建治理秩序，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第一，要坚持依法治理，发挥法律的规范和强制作用，为治理现代化奠定法治基础。法律是公共权力的后盾。治理现代化的典型特征与评价核心标准就是治理法治化。依法治理，一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是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1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适合我国特殊的历史发展、民族关系和民族分布以及文化特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在经济全球化、利益多元化以及阶层日益固化的社会变革时期，少数民族同胞的国家认同面临着各种冲击，需要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增强治理力度，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渝东南民族地区是重庆市唯一集中连片、全国为数不多的以土家族和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整体不高。各级政府要坚持统一与自治相结合、多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的原则，对地区民族事务处理、干部队伍建设等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完善，切实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切实保障各族人民的合法权益，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为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二要深化民族地区各基层组织和部门依法治理。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在基层、在村社。要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法规，推进民族地区村委会、居委会等依照法律和章程自主管理事务，使基层各族群众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中树立法治观念，提升法治素养，提高依法治理能力。要深入推进各行政部门依法行政，基层司法部门积极融入、参与、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让每一个群众感受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三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我们一方面可以通过采用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加大普法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立运用法律原则、法律规则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观念和意识，逐步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习惯；另一方面以促进民族和睦共处为落脚点，完善矛盾纠纷调解机制。如，采取事前预警、事中联调、事后分析研判机制，针对不同民族之间、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之间的矛盾纠纷，以及多发的农田与山林边界、牲畜践踏啃食庄稼等常见矛盾，采取有力措施及时化解矛盾纠纷，确保民族地区城乡安全、社会安定、各族群众安宁。

第二，坚持以德治理，发挥道德的引领和教化作用，为治理现代化奠定思想道德基础。推进以德治理是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步骤。首先，要加强党员干部思想道德建设，带动社会形成良好道德风尚。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广大党员干部能否在学习、工作以及日常生活中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是社会形成良好道德风尚的关键所在。这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升理论素养；要向国家和当地社会生活中涌现出来的道德榜样学习，提升道德践行能力，努力成为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其次，加强民族地区公民道德教育，发挥道德的引领和教化作用。一方面，依托国民教育体系，在大中小学生中开展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包含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民主与法制教育、生态与环境教育、网络道德教育、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育等为主要内容的公民道德教育。另一方面，加强家风教育，充分发挥积极进取、乐观向上、勤劳勇敢、艰苦朴素等良好家风对人的潜移默化作用。通过公民道德教育，在全社会营造崇德向善的文明氛围，推动民族大团结与大繁荣，打造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新标杆。

(五)以高质量发展龙头为治理现代化夯实物质基础

恩格斯在《起源》中强调，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2186]民族和国家的产生、发展和消亡，都以生产力极大发展为前提。当前，渝东南民族地区治理现代

化的前提和核心,是经济现代化。如前所述,渝东南民族地区发展不足是最大的实情。为了从根本上增强渝东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各区县要积极把握国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一区两群”发展新布局等重大机遇,紧抓发展的“总钥匙”,实现新作为,展现新突破,坚持以创新为引领、以市场为主导、以信息化为支撑,不断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构建既有发展速度、更有发展质量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在工业方面,立足工业“1+2+X”产业体系,狠抓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促进工业经济质的优化和量的增长;在农业方面,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如,以优质高产示范片区建设为抓手,大力发展山羊、青花椒、蔬菜、中药材、茶叶、油茶等主导产业,加快发展荞麦、优质稻、鲜食玉米、特色水果、土鸡等特色产业,稳定粮油种植面积和产量,保障主要农产品供给能力;建设田园综合体,打造特色旅游村,强化旅游要素培育,加大宣传营销力度,提升智慧旅游水平。通过努力,逐步缩小渝东南民族地区与主城区乃至全国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总之,马克思主义治理观中蕴含的哲学智慧为渝东南民族地区在推进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把握治理的本质,确定地区治理的方向和实现路径提供了逻辑遵循,相信渝东南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将是马克思主义治理思想在中国西南边陲地区生动而成功的实践。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97.

[6]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继续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N].光明日报,2020-06-11.

[7]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5.

[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

[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367.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N].光明日报,2018-03-22.

[11]习近平.在新的起点上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J].求是,2019(5):6.

[12]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N].人民日报,2016-12-11.

[13]吴桂韩. 深化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规律的认识[N]. 江西日报, 2020-05-04.

注释:

1 渝东南地区即指包含重庆市黔江区、武隆区、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酉阳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和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在内的“两区四县”。

2 重庆市总幅员面积 82400 平方公里,其中黔江 2402 平方公里、武隆 2901 平方公里、彭水 3903 平方公里、酉阳 5173 平方公里、秀山 2450.25 平方公里、石柱 3014 平方公里。

3 重庆市 2018 年总常住人口为 3101.79 万,其中,黔江为 48.39 万、武隆为 34.82 万、彭水为 48.85 万、酉阳为 54.71 万、秀山为 48.57 万、石柱为 37.8 万。

4 重庆市 2018 年地区生产总值共实现 20363.19 亿元,其中,黔江为 247.29 亿元、武隆为 181.63 亿元、彭水为 170.1 亿元、酉阳为 157.95 亿元、秀山为 185.64 亿元、石柱为 175.97 亿元。

5 重庆市 2019 年贫困发生率为 0.12%,其中,黔江为 0.05%、武隆为 0.03%、彭水为 0.49%、酉阳为 0.5%、秀山为 0.32%、石柱为 0.23%。

6 重庆市 2019 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8920 元,其中,黔江为 24298 元、武隆为 24929 元、彭水为 19537 元、酉阳为 17027 元、秀山为 21862 元、石柱为 23485 元。